

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运行及活化路径

袁 芳

摘 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和基层民主制度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体现了党对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把握。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呈现为物理空间、制度空间、网络空间以及精神文化空间等多元空间形态的良性运行,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全新的空间融合、平等的空间互动和共享的空间秩序,有助于激活政治参与过程,增强民主实践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在数字技术价值、空间权益保障、协商意见表达、协商回应落实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秉持创新思维、开放思维和协同思维,亟待整合空间形态、优化空间关系、创新协商模式、凝聚空间合力,充分释放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活力和效能。

关键词: 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空间运行;空间活化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2-0021-09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广泛参与。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1]将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和基层民主制度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体现了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把握。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核心任务在于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和基层民主制度,不仅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独特优势,促进改革共识的形成,还有助于加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防范和化解国家数字化发展中的各

种风险。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最活跃也最具创新力的表现形式,对加强大统战工作、确保改革举措稳步推进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动协商民主与日常治理架构的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党员代表共同参与的基层协商民主模式。当前随着“智慧协商”“码上议”等数字协商模式的蓬勃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在数字化浪潮下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进入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格局与空间互动模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空间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场,拓展发展空间是打开基层协商民主新局面的重要方式,这就需要深入理解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意蕴。理解和利用空间的特性,为理解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问题域和分析框架,有助于积极回应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的新形势。

收稿日期: 2024-08-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1SZK1005300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适应性研究”(0821200410)。

作者简介: 袁芳,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249)。

一、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样态及运行机理

人与空间是双向建构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人类的实践和交往活动投射和复现了空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人作为空间生活的主体,本身又通过空间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塑造着人之所在的空间特性,形成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空间,体现着人类实践的需要与价值。马克思将空间和感性的人及其生产劳动活动连接起来,提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由此,空间成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场所,弥散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空间的内涵和关系日益复杂,空间在社会互动和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动态角色,空间成为能动的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基层场域不仅是政治决策和治理的场所,也是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的重要空间,空间的性质和布局也影响着协商民主的开展方式。政治学者将民主理解为作为价值观念的民主、作为实现形式的民主、作为实现过程的民主^[3]。这一理解框架为我们深入理解民主的本质及其实践提供了思路,民主的实现需要在坚守民主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及运行机制,推动民主实践的持续探索与动态发展。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丰富了民主的理论内涵,还为民主实践开辟了多样化的空间维度。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样态主要表现为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制度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空间业已成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资源,多元空间的运行和相互作用,不仅提高了基层协商的民主性和包容性,而且增强了民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使得民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1. 物理空间直接影响基层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

物理空间是基层协商民主参与和决策的场所,其设计和运行方式直接影响到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物理空间为民众提供了相对固定的场所,使其能够聚集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通过物理空间的直接参与,民众可以面对面交流、分享观点,能够将自身需求和问题直接反映给决策者,可促进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及时调整,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和质量,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让其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协商过程中。同时,固定的物理空间,有助于引导民众跳出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关注公共

领域事务,从而增强公民的身份认同。城市的“社区会客厅”“居民议事厅”等是城市居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物理空间,主要以组织居民会议、共同讨论、投票等方式进行。由此,居民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对社区的发展规划、管理问题等提出建议和反馈,有效促进了居民和社区管理者的互动,有助于二者建立信任和理解,提高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乡村村民活动中心”“乡村文化礼堂”“村民协商议事厅”等是村民集会的主要场所,通常位于村庄的中心位置,方便村民参与议事协商。通过召开村民大会、举办文化活动和公共事务讨论等,提高村民对村庄管理和决策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办公室作为村民提交建议和投诉的场域,通过定期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乡村治理和发展事宜。这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正式的空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2. 制度空间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和体系化

协商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协商程序的规范有序是实施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制度本身具有空间属性,直接影响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因此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兼具秩序和活力的制度空间。目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形成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及地方性的法规和操作指南,它们共同构成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职责、选举方式和议事规则。此外,各地企事业单位通过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企事业单位员工的民主权利,为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提供了重要渠道。通过不同层次的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既能广泛收集民意,促进参与协商的民众的意见获得平等考量,又能防止少数利益团体操控协商成果。习近平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分类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明确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及时总结了协商民主发展中的基层经验,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和具体政策文件,为协商民主在基层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标准,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规

范化和体系化。比如,河南省邓州市首创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就是在村民自治中逐渐探索形成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该创新方法作为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参考模式被推广,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3. 网络空间扩大基层协商民主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网络空间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多种参与方式,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直播会议等方式更加灵活和便捷。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参与方式,这不仅增加了民众参与协商的途径,也提高了参与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政府网站、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平台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多样化的网络空间,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播、民众的广泛参与、意见的有效反馈以及决策的透明化。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信息、会议通知和决策草案可以迅速传达给大量的民众,而民众的意见和反馈也能即时回传给决策者。这种快速的双向通信机制大大提高了信息流通的效率,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网络空间能够帮助民众及时了解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促使更广泛的民众加入协商民主的进程之中,使得民众更好地成为国家的主人。近年来,各地兴起的在线协商等新型协商方式极大缩减了协商的经济成本,提高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效率。依托在线调研、数字投票等民意采集方式,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能够更为精准及时地分析民众的诉求,对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推动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

4. 文化空间有效培育公民民主协商的意识和素养

空间不仅是互动发生的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的构建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平台。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思想交汇的文化空间,使不同意见得以融合与交汇,为寻求合理的基层治理方案打通了渠道。基层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治理方式,更是培育协商文化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涵养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素质。习近平提出:“我们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5]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基层协商民主促

进民主实践和谐与包容,有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空间有助于强化民众的共同价值观,使得协商民主中的讨论更具文化内涵和深度。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基层治理中公平正义的诉求更加强烈。民主是人类认识自我与自我管理永无止境的事业,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具有制度与技术层面的要求,更表现为意识与价值层面的追求。基层协商民主的文化空间蕴含尊重、合作、包容等共同价值观,能够促进多元思想观念的交流,为启发和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撑。比如城市社区通过让居民认领社区的部分公共空间区域,建立居民和社区公共空间之间的有效联结,强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彰显了公共空间的文化意蕴。

二、数字技术对基层协商民主空间运行的积极作用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广泛参与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实现深入讨论,促进协商的精准化和透明化。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全新的空间融合、平等的空间互动和共享的空间秩序,有助于激活政治参与过程,增强民主实践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为基层协商民主空间运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 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全新的空间融合

数字时代的时间与空间关系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迁,展示出一种既分离又交织的动态景象,不仅触及物理层面,更深刻影响到社会行为实践及个体感知的维度。回顾传统的农业及工业社会时期,时间与空间紧密交织,构成生产生活的基础框架,受限于实体地域的局限。随着二者的逐步分离,实体空间的制约力相对减轻,人类活动得以在网络空间内独立操作与感知,人际关系的联结模式亦转变为数字形式。数字空间的拓展主要依托互联网及相关技术支持,实现了物理世界与虚拟领域的融合发展,冲破了以往地理界限的桎梏,重塑了时空互动的新格局。这种融合使得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虚拟平台上进行即时的交流和协作,从而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中跨区域、跨文化的沟通与合作。比如,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不同空间形态的连接,有助于推动物理空间、制度空间、网络空间、文化空间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在改变人们

日常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利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以及整合传感器、计算机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数字技术提供更身临其境和更具交互性的体验,进而实现民主参与的智能化。数字空间不仅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崭新场所,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数字空间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场景需求,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空间,如云服务、虚拟会议空间等,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和情境变化进行快速调整。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实现远程投票以及虚拟会议系统组织网上议事活动,这种线上线下空间的有效互动与互补,使协商过程中的沟通效率和决策速度得以极大提升,时间节奏在传统的空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2. 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平等的空间互动

数字时代人们所特有的空间具有流动性特征,在参与和互动层面,不仅促成了社会结构和信息流通方式的变革,也为个人拓宽了活动的空间边界。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社区和乡村为基础的协商民主实践,赋予城乡居民直接参与政策构思或由代表实施监督的权限,加快直接民主的发展进程。建立数字协商平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地介入到决策的过程之中,有利于各种意见和声音能够被听到并纳入决策考量的范畴。当决策过程趋向高度透明,公众问责力度不断加强的时候,更接近实现公正配置资源、彰显社会公正的愿景。由此,公众参与政策讨论的影响因素得以减弱,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工具,使广大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得以直接表达。基层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和包容性,无疑为数字时代平等开放的交流注入新的活力。依托数字化平台,每个个体均能扮演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的角色,通过诸如社交媒体、个人博客等渠道,向广大听众传达见解,推动了信息的普及化进程。尤为显著的是,数字空间削弱了不同社群间的界限,推动了更为平等的社交互动。匿名性特征能够保护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者更为真实地表达意见和建议,增强了社会的动态多样特性。数字技术赋予用户沉浸式的体验感受,从根本上转变了个体与虚拟空间的互动模式,拓宽了人类认知与感知的范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生存空间,过去时代因为地理空间、户籍制度、有限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较为稳定的群体空间,现在转变成了全

国、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空间。”^[6]数字化社会所特有的流动性空间展现出高度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信息与社会联系的更迭日益加快。数字空间的功能可以根据需求快速调整 and 变化,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在数字空间中,个体可以拥有多重身份和角色,这增加了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和个体的自由度。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改变了个体的心理空间,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提出“微粒社会”的概念,强调数字化进程使个体如同微粒一般被精确解析和定位。这种精细解析使得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并且在不同的空间中自由移动。

3. 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共享的空间秩序

当前,具有共享性的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为共享开放的数字空间提供了社会存在的基础。数字领域构筑了一个知识与资源的共用库,使得个体能够互动交流认知和传播经验。这一协同机制催化了基层协商民主的进程,促使其向更高透明度与合作性的方向演进。比如,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的“红茶议事会”,“依托城市云端数据仓,将网络舆情、信访业务、居民信箱、110警情联动、城市眼等原始数据汇集到平台后台。通过对民意热点的分析,及时感知居民关心的问题,形成民意画像和民意数据库”^[7]。由此,实体世界的多元信息被转译成量化的、可操作的数据格式,此过程即所谓数据化。在数字化交往中,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数字空间的权力。数据化不仅标定了空间信息的规范化与电子化路径,也铺设了数据共享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共享化的实践确保了这些珍贵数据资产的广泛可达与高效利用,为深化空间解析与策略决断提供了支撑,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透明的社会生态系统,增强信息的公开性,促进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经过数据化处理的空間知识可以创造出更加逼真的体验场景,并与虚拟现实(VR)技术和增强现实(AR)技术相融合。将这一技术用于模拟社区规划、公共设施布局等议事场景之中,能够引导民众更加直观地理解基层治理方案。“空间正义要协调空间利益分配,实现各空间主体的良性互动,不是追求空间表面的均衡,而是建构和谐的空间关系,实现空间资源的共享。”^[8]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共享,更加公平地分配空间资源,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判定协商议题,全面评判协商过程中的各种信

息和意见,从而提高协商的效率和透明度,促成协商共识的达成,增强民众对协商过程和结果的信任感。

三、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空间运行面临的问题

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在数字技术价值、空间权益保障、协商意见表达、协商回应落实等方面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习近平提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9] 风险挑战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生,因此需谨慎应对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1. 数字逻辑带来的技术依赖风险

数字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生存在被数字技术“笼罩”的数字空间中,容易形成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物理空间的数字化开发和利用日趋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空间并非一个独立于其他空间形式的全新空间,而是人类社会形式在数字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取得数字化形态的产物,是实际的社会空间,是数字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特定‘场所’(place)形式”^[10]。人们在享受数字空间带来协商便利的同时,又容易被其反控,尤其需要正视数字逻辑带来的技术依赖风险。数字技术的原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替代人类进行运算的数学逻辑,数学逻辑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能够描述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但也会导致对现实世界中复杂现象的过度简化。平等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数字时代由数学逻辑主导决策流程,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并非必然促进平等。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广虽然开辟了一个新颖的协商民主的平台,但在接触和运用数字技术的不同社群中,也进一步催生了数字分化的问题。同时,民主参与中人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数字技术的内在逻辑所削弱,比如过分依赖算法进行决策的过程,可能会淡化协商中面对面的沟通和深层次的讨论。数字技术的使用虽然使信息的传播范围大大拓宽,但信息不对等的现象也有可能加剧。在现代性情境和技术权威的双重作用下,社会治理强调的是效率和便捷,容易忽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特别是掌握大量数据和平台资源的大型科技公司一旦实施数字垄断,将会影响协商民主的空间正义性。同时,涉及大量个人资料收集

和处理的数字化咨询平台的广泛应用,加大了泄露个人隐私和资料安全的风险。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或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侵害,也会对政治参与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2. 部分群体的空间权益保障不够

人类的实践活动与所处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空间对社会的改造愈发明显。各种政治力量借由空间的调控与配置来加强并实践其权力,而空间则负载着多样的社会性、文化及政治特性。马克思高度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城乡失衡、空间生产扩张等空间现象,批判了抽象的空间观,深刻揭示了空间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强调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对空间的影响。由此,空间的生成和演变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斗争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空间的配置和控制反映了社会权力结构,空间体现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空间既是权力争夺的场域,亦是权力形成和发展的必要资源。政治活动依靠空间的作用,空间直接参与并构建了社会关系。同时,空间对于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个体和群体通过与特定空间的互动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这些身份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在更广泛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行动。由此,权力既依赖于特定的空间,又表现为在空间中的再生产性和流动性。空间既是维持统治秩序的媒介,也是反抗与抵御的实践场域。就基层协商民主而言,其协商共识容易受到空间内部权力结构的影响,某一些人可能会利用其资源和影响力主导共识的形成。尤其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仅由少数人或利益集团通过操纵信息和议程来推动,那么整个社会可能会错失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因此,审视不同群体在空间中的权利和机会是否平等,空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是否公平至关重要,守护人的空间权益显得尤为紧迫。不同地域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可能导致部分乡村地区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声音和需求在协商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表达和重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协商的公正性。因此,在基层协商民主的语境下,部分群体的“空间隔离”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实施。缩小数字鸿沟、保障每个个体的空间权益,不仅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关键,也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3. 协商意见表达的公共理性欠缺

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11]78}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以基层群众自治为重点,多元性的意见涌流是促进群众自治的前提基础。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强调的是民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参与和集体讨论。这种民主形式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公共理性,即能够基于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进行合理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数字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公共理性的要求更高。然而,公共理性所需的面对面交流、共同在场和直接感知的条件在数字时代被削弱了,当公众无法进行深入、理性和全面的讨论时,就很难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 and 理解,这直接影响共识的形成。基层协商民主的持续发展依赖于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对民主文化的价值认同,提高村(居)民的参与度一直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当前,民众的利益需求更加多元化,数字化平台提供了远程参与协商的可能性,但虚拟环境下的沟通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深度和质量,影响协商过程中的情感共鸣和共同价值观的构建,从而可能会降低公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网络交流中,持有相似观点的个体倾向于彼此聚集,而与持不同观点的个体保持距离。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群体内的观点愈发一致,而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则加剧,这削弱了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的机会。网络环境特有的匿名属性、去个性化及快速反馈机制促使个体更倾向于表述极端立场或从事冒险行为。此外,信息的海量与网络空间的复杂特性限制了个体进行深度思考和细致分析的能力,使他们难以全面评估信息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从而倾向于依据简化法则或直观感受作出判断。鉴于缺乏实体交互的场景,个人在构建自身见解时,可能过度依赖所属在线社群的一致看法与规范。这一现状导致网络讨论往往不是严格基于逻辑推理或客观事实,而是深受情绪、偏见及其他非理性情感的干扰,因此妨碍了协商民主的品质与实效性。

4. 协商结果的回应落实尚有不足

当前,在具体的数字协商民主实践中出现了“指尖形式主义”的问题,过度留痕、机械打卡等“指尖活动”将关注点集中在高效的数字工具和流程之中,造成了额外的工作负担,而对协商结果的有效回应关注尚显不足。一些基层地区缺乏系统完善的协商程序规范,使得协商议题常常难以确定,增加了沟

通成本,带来治理资源的分散和重复投入,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追求普遍性的政策回应难以为地方性、区域性问题的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增加了协商结果的不确定性^[12]。同时,协商中的程序保障机制以及协商后的监督反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容易造成协商结果的落实停滞和落实走样,因此降低了协商结果的接受度和执行力度。“有效的民主必然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民主的‘回应性’是评价民主是否有效的标准。协商结果,即协商达成的共识能否及时得到应用落实,是检验协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协商意见与结果较难进入决策或者被执行实施,这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13]基层数字协商如果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导致协商结果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达给相关利益方,将影响协商的实效性和持续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来促进协商民主机制的整合和优化。

四、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空间的活化路径

空间活化意味着特定空间功能和活力的激发与提升,蕴含着对空间的重塑和再利用,从而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习近平提出:“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11]794}这一理念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对基层协商民主空间的活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正视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空间运行的现实问题,需要把基层协商民主与数字空间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考虑,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实践的空间进行赋能,在协商过程中促进互动与对话。秉持创新思维、开放思维和协同思维,亟待从整合空间形态、优化空间关系、创新协商模式、凝聚空间合力等方面入手,为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健康活跃发展探寻出一条妥适的方向性路径,以充分释放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活力和效能。

1.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整合空间形态

坚持人民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多元空间融合的价值原则,这就需要激发多种空间形态的活力,认真审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彰显人民群众在协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通过发挥乡村和社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民主的

领导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配合作用和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形成基层治理共同体。基层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决策的民主化。通过基层协商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同的空间形态对民众参与的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整合多元空间形态不是简单的空间叠加和空间交替,而是不同空间形态的优势互补。既要充分发挥物理空间促进情感交流的直接影响,又要发挥制度空间的刚性支撑作用,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和文化空间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数字空间为协商民主提供即时反馈和数据驱动,有助于提高基层协商的效率和治理效能,因此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着力解决数字资源分布相对不平衡的问题,充分发挥数字空间的优势,促进协商决策科学化。

城市、乡村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商民主因空间属性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运作模式,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打造空间特色,吸引村(居)民和职工的积极参与。同时,空间不仅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活动场地,更是培育治理共同体重要土壤,这就需要将物理空间建设和精神文化空间建设整合起来,促进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创建贴近群众真实需求与体验的多元化空间,有助于激活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现代个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以共同体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实现为前提,一旦人作为固有存在方式的共同体被消解,个人将无法成为个人,更不用谈个人的发展,同时治理共同体要保证个人的独立、自由、个性,以实现共同体内部每个人都获得公平、公正、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

协商民主在物理空间中有时很难完全满足不同个体的需求,因而需要借助精细化的流程来增加其实效性和包容度。比如引入线上预约机制,对会议的时间、地点进行智能调度,以扩大参与人群的范围。多语言服务系统的推出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背景下的群众需求。对公共广场的讨论会、庭院会谈等多种实体空间进行优化,有助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面对面的协商空间。对实体空间中与周围自然环境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记忆进行强化,提升民众的体验感受,有助于促进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社群联结。制度空间及其所承载的制度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为了提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透明度和可参与性,在细化过程上下功夫

是十分必要的。要将制度、政策的制定过程与结果公之于众,使公众对政策的形成过程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为了促进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需要鼓励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建立公众咨询机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另外,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在提高网络空间协商民主的安全性及可信度方面需要细化流程,主动防范网络空间的潜在风险。

2. 完善协商运行机制,优化空间关系

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14] 确保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性、持续性及稳定性,对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基层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健全数字技术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制数字时代不同主体的空间关系。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范政府、社会组织、村(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角色定位,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得到强化,领导核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如何有效地运行,需要探究协商民主怎样能更有效地嵌入其他制度。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的支撑,要嵌入基层治理结构之中,要联结到政府决策与执法机制之中^[15]。因此,在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协商权利的同时,需要将多元主体纳入由基层党组织领导、发挥各自治理优势、促进协同共治的协商框架。

协商共识的形成并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反复沟通的动态过程,因此为了促进基层协商共识的实现,离不开多轮反复协商,这就需要通过法律规范赋予不同主体在不同空间中的利益表达权。如果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良性运行,协商成果在推进过程中则可能会遭遇各种困难,甚至造成秩序的混乱。即使相关措施能够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得以推行,也将面临制度失灵的风险。由此,利益表达不仅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协商成果的重要保障。依托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协商,在扩大公众参与、增强透明度等方面有巨大潜力,然而要充分发挥这一新兴模式的优势,就必须对其运作机制进行精细化设计与持续优化。数字协商流程的设计应兼顾效率与公正,既要保证信息的充分交流与意见的多元表达,又要避免冗长低效的讨论过程。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数字协商的议事范围和流程,完善协商结果的回应机制。对于通过数字平台收集到的各类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应及时、准确地进行梳理与反

馈,确保协商成果能够顺畅转化为政策或行动方案。

此外,需要强化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加强数据的安全使用。加密技术应用、严格的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手段需要在数字空间的构建过程中有效运用,从而保障居民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和数据的安全性。“倘若不能充分地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就容易出现非法收集、出售和利用个人数据,侵害个人人格权、财产权的问题。”“海量的个人数据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战略价值。没有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整理和利用,数据技术就无法发展,数据产品就无法被开发。”^[16]总之,以法律手段维护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者权益,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架构,确立清晰的协商程序与规范体系,这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常规化运作提供依据,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中多元主体的空间关系,以保障参与者权益并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风险。

3. 遵循数字空间发展规律,创新协商模式

基层协商关乎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民主决策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提出:“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7]这明确了广泛深入、分层分类的协商基本要求,协商需要集思广益和深入细致,针对不同范围的群众利益,协商的对象应有所区分。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空间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场域和承载基层协商活动的重要平台,基层协商民主应遵循数字空间的发展规律,推进全覆盖、精准化的数字协商模式。

尽管数字技术带来诸多挑战,但人类不能摆脱数字化生存。正如唐·伊德(Ihde, D.)提出的:“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18]数字时代基层协商民主主要顺应数字化发展的规律,创新既符合协商民主发展又遵循数字技术逻辑的模式,最大程度实现数字技术与基层政治参与的协作,各自而为又彼此促进。通过创建易于操作的数字交流平台,可以让不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和状况的民众无障碍地利用这些平台参与到决策和治理过程中,有助于提高协商民主参与的全

面性和代表性。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协商平台不仅可以提供文字、图片信息,还能提供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内容,丰富了协商的形式和内容。因此,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协商的形式和内容,如线上调查、在线讨论、虚拟会议等,进一步提高协商的便捷性和参与度。

遵循数字空间交互性和沉浸感的发展特点,数字协商平台的设计应秉承包容性的设计理念,在空间互动模式上突出多样化的特点,以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加入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还要加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整合数字平台的各种数据,形成基层协商的数据资源池,利用智能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对协商议题进行智能筛选和推荐,为基层协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了促进数字协商的规范化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评估体系,对数字协商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数字协商的流程和策略,确保数字协商活动的持续有效推进。

4. 培育数字协商能力,凝聚空间合力

数字空间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合作性与协商民主的本质追求有内在的契合性,村(居)民通过参与协商能够学习如何理性表达自己的意见,倾听和尊重他人的观点,从而培养公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能力,使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参与到政治发展中来。为了保障各群体平等加入数字化协商行列,通过推进数字化技能教育、优化网络设施条件等措施,可以减少信息获取的差异。

协商能力的提高是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源头活水,培育数字时代的协商文化,使不同的社会群体能够在数字空间中开展协商,实现更广泛的利益共识,能够凝聚起强大的空间合力。村民广泛有序的参与离不开以法治、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理性等理念为标志的现代公民协商文化。因此,党和政府应大力培养基层群众的协商文化,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协商的理性化^[19]。提升村(居)民对数字领域的认知与操作能力,加强协商文化的培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激活基层协商民主的精神文化空间任重道远,协商民主蕴含包容、尊重和合作的文化理念,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协商理念,有助于增进民众的协商智慧。

要致力于推动数字化素养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民众的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通过实施教育项目和文化活动,促进公民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展现更

高的理性水平。通过宣传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果,增强协商责任意识。多渠道加强协商民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教育,巩固多元化的公众参与形式和对话机制,培养民众的批判性思维,帮助其抵御数字时代潜在的信息操控和偏见现象。从数字空间中挖掘多元文化价值,有助于促进数字时代共商共融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4-07-19(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9.
- [3] 燕继荣.民主化的含义及拓展空间[J].国际政治研究,2016(2):36-50.
-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1(2).
- [5] 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J].求是,2024(7):4-13.
- [6] 陈家刚.数字协商民主: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J].中国行政管理,2022(1):26-32.
- [7] 黄俊尧,裴孟娜.数字化如何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基于杭州“红茶议事会”案例的分析[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4(2):16-25.
- [8] 孙全胜.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基础、逻辑与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137-149.
- [9] 习近平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N].人民日报,2024-11-21(1).
- [10] 刘亚品.数字空间:互联网社会的现实建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0):103-108.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2] 孟天广,严宇.协商回应:共识导向的基层回应模式——基于淮安“码”上议的案例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4(6):103-112.
- [13] 王素娟.切实保障基层协商议事运转有序[N].学习时报,2023-07-19(3).
- [14]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 [15] 郎友兴,万蕤.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构建与有效运行: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与扩散[J].探索,2019(4):98-109.
- [16] 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J].中国社会科学,2018(3):102-122.
- [1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 [18] 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
- [19] 秦国民,秦舒展.论激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三维”动力[J].中州学刊,2020(9):1-5.

The Spatial Operation and Activation Path of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Yuan Fang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dentifi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echanism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 as the focus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s, reflecting the Party's profound grasp of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The current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presents a benign operation of multiple spatial forms such as physical space, institutional space, network space, an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pace.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spatial integration, equal spatial interaction, and shared spatial order for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hich helps activat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ocess, enhance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democratic practi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issues in terms of the value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tection of spat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xpression of negotiation opin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gotiation responses. Therefore, it is a must to adhere to innovative thinking, open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ve thinking. 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spatial forms, optimize spatial relationships, innovate negotiation models, and unite spatial forces to fully unleash the vit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digital age;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patial operation; spatial activation

责任编辑:墨 恩